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16辑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十六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16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ISBN 7-5004-1509-5

I. 外… II. 中…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研究-中国②文学研究-外国文学-中国 IV. I1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0138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市天堂河被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毫米1/32 印张: 11.625 插页: 2

字数: 300千字 印数: 1—1200册

定价: 7.00元

目 录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十六辑

新历史主义初评·····	赵一凡(1)
俄国象征派的文学语言观·····	周启超(26)
布洛赫关于“遗产”的理论·····	张 黎(43)
朗松:永远的参照·····	郭宏安(68)
爱默生和东方·····	钱满素(90)
巴赫金对话理论阐述·····	董小英(117)

当代美国戏剧中的荒诞

——兼谈后现代时期戏剧中的荒诞性·····	申慧辉(133)
法国古典主义对七星诗社的批判和继承·····	吴岳添(156)
论波兰象征派文学·····	张振辉(176)
论朝鲜稗说文学·····	周有光(193)
勾画精神的苦难历程的伟大作家——黛莱达论·····	吕同六(210)

困惑·探索·创新

——高尔基2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	张 羽(233)
高尔基长篇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思想艺术上的某些特点·····	张晓强(256)
费特的晚期哲理诗与叔本华的“意志论”·····	张 耳(278)
黑塞:沟通东西方的桥梁·····	张佩芬(295)
克莱斯特小说的创作技巧·····	李永平(315)
呼唤民族意识觉醒的歌者	
——论魏勒什马尔蒂及其诗歌创作·····	冯植生(335)
一种比较研究:中德作家笔下的中国美女褒姒·····	高中甫(351)

Contents

Zhao Yifan: An Exploration of New Historicism.....	(1)
Zhou Qichao: The Russian Symbolists' View on Literary Language	(26)
Zhang Li: On Hermann Broch's Theory of "Heritage".....	(43)
Guo Hong'an: G. Lanson: A Reference of All Times	(68)
Qian Mansu: Emerson and the Orient.....	(90)
Dong Xiaoying: An Account of Bakhtin's Theory of Dialogic Discourse.....	(117)
Shen Huihui: Sense of Absurdit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Drama	(133)
Wu Yuetian: French Classicism: A Sublation of the Pleiade	(156)
Zhang Zhenhui: On Polish Symbolist Literature	(176)
Zhou Youguang: On Korean Narrative Literature	(193)
Lü Tongliu: G. Deledda: A Great Writer of Man's Spiritual Pilgrimage	(210)
Zhang Yu: M. Gorky's Narrative Fiction of the 1920's	(233)
Zhang Xiaoqiang: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Gorky's <i>The Life of Klim Samgin</i>	(256)
Zang Er: A. A. Fet's Philosophical Poetry and Schopenhauer's Mediation of Will	(278)
Zhang Peifen: Hermann Hesse: A Bridge Connect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295)
Li Yongping: On H. Kleist's Narrative Techniques...	(315)
Feng Zhisheng: Vorosmarty Mihaly and His Poetry ...	(335)
Gao Zhongfu: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hinese Beauty Baosi by the German Writers.....	(351)

新历史主义初评

赵 一 凡

“一个幽灵——一个被唤作新历史主义的幽灵，正在袭扰批评领域。”警告来自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官方刊物PLMA1987年专题报告。报告人呼吁同行密切关注这一新兴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批评动向”，并称其特征是“将历史和当代政治生活从整体或本质上视为斗争、对抗、权力网与利比多因素所决定的现象”。同期发表于卷首的是美国学院派批评领袖，新任学会主席J·希利斯·米勒的就职演说辞。其中也以新历史主义为题，并不无忧虑地展望道：在“过去的几年里，文学研究经历了突兀而几乎是普遍的转折，即从那些由语言定向的理论相应地走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与性别，以及社会背景和物质基础”。对于这场继60年代“语言学转折”之后发生在文学领域内最大的“历史或文化转向”，米勒强调它具有厌弃理论及文本研究的性质，担心其反拨势头会危及现存批评建制。^①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当代美国批评潮流的演进逻辑如此偏执，似乎不容人停足稍息。新批评之后，追寻新范式的运动在科学意志驱迫下不断破坏常规，加深危机，却在兜了个大圈后回归到对历史与社会的重新关注上来。这一返转又恰好尾随解构批评刚到手的胜利。作为全美文学教研团体的权威发言人，米勒登台

之始便宣告他面临强大挑战。而这类表态一般仅仅作迟到的礼遇，正式肯定对手不容忽视。

事实上新历史主义迄今已有10年的徘徊扩张历史。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它于70年代末英美批评界初露端倪。当时虽无确切称谓，它的一批先驱人物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多有突破与试验，呼应同期在法国、意大利活跃着的新历史学派。在英国，著名的如渥尔伯格-考脱德研究所成员。在美国则公推古典英文教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路易斯·蒙特鲁斯，以及创办新历史主义理论刊物《表征》（Representations）的凯瑟琳·伽勒尔。

80年代初，上述专家的一系列论著相继发表，引起英美学术反响。较早使用新历史主义一词指示该动向的评论有两篇，分见1980年《分析批评家》上刊登的综述，及蒙特鲁斯1981年针对格林布莱特名著《文艺复兴中的自我造型》的书评。^②此时尚未就名称求得一致，因而造成新历史主义同文化符号学、文化唯物主义的混用。直至1982年格林布莱特应约为《文类》杂志撰写该派的集体宣言，人们才正式接受其定称为“新历史主义”。此名后在美、英、新西兰、加拿大等国流行，通读作New Historicism，唯在澳大利亚拼成Neohistoricism。^③

80年代中期，新历史主义已在古典英文领地养成气候，促动该传统学科的深刻改造。美英有关学术机构和学刊频繁集会并收编革新论文集。如两国的英国文学研究会、《文艺复兴文学评论》和《莎士比亚研究季刊》等相继推出《政治莎士比亚》（1985）、《莎士比亚再造》（1987）和《文艺复兴历史主义》等文集，后一本被誉为典范，自1980年后再版达7次之多。大约同时，新历史主义作为成功方法开始进军其它研究部门，颇有席卷并改变整个文学教研制度的势头。这方面的突出动向有两件：一是由哈佛教授萨克万·勃克维奇领导的美国文学史重修工

程,高扬新历史主义旗帜,反映出与西岸发源地不同、但又影响全局的一种延伸;^④二是新历史主义作为理论课题引起广泛关注,就在米勒当选现代语言协会主席前后,该会多次召集全美范围的各方批评代表,专题商讨新历史主义涉及的众多问题,其中较重要的三次会议分别题名:《专业制度、政治参与和北美批评家》(1985),《新历史主义:政治参与和后现代批评家》(1986),以及加州大学批评理论所主持的《表征目标:主体、文本与历史》(1987)。

如同多数由弱变强的学术潮流,新历史主义在80年代后期的扩变过程中变得复杂含混了。一面是号召力渐增,追随依附者日众。一面又不免从内部滋生出分歧和异议,形成同后结构主义、左倾文论、女权批评交相融汇态势下的自身裂解。派系矛盾方面,除去东、西岸地域差异,还产生出诸如“右翼新历史主义”、“抵抗派新历史主义”、以及像格林莱特那样重新竖起“文化诗学”旗号的独立派。原有的活动中心,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表征》学刊,现在受到众多的竞争性挑战。

在最近推出的首本新历史主义理论集里,主编人列数20位作者的纷纭意见,首先肯定这场运动的成绩和影响力:它已渗透到包括“美国早期文学、英国浪漫主义、维多利亚研究、拉美文学”在内的“几乎所有文学城堡”,并且无疑成为各种理论流派激烈加以争夺控制的“中心战场”。然而大堪忧虑的是,这一同时给人带来惊惧与期望的潮流来势突然,支配力量过于纠结繁乱。因而很难料定它将如何发展。抑或因内在矛盾自行崩解,抑或走向偏激僵化,凝结成人们不得不破除的学术教规。^⑤

关于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刚刚起步,运动本身又处于变化之中,因此尤忌硬性归纳和结论。本文拟初步描述其生成背景,概要评点它较为突出的理论与实践特征,同时指示一些主要争异点

及未定因素。至于它作为一种新批评范式的可能前景，大半须留待进一步考察。

一、生成背景与思想渊源

有关新历史主义的“发生学”分析，美英评论多强调三个方面的关联条件，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主），后结构主义（以法国的德里达、福柯为重点），以及针对这两股当今的超级理论势力不得不作出反应的美英经验主义实用传统。从地缘政治与学术角度看，新历史主义在美英等国兴起，也自然同10年来欧陆哲学的演进与冲突密切相呼应。例如，美国左倾文论弗兰克·兰特里夏曾提出一个简明公式，认为新历史主义等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福柯式移位”，或者不妨戏剧化地喻为“马克思和福柯在美国的奇特联姻”。⑥

此说有助于我们粗略设定新历史主义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上的图文座标。但它远不足以说明其间复杂交错的亲缘关系。为求客观计，下面试以西马和后结构主义的竞争碰撞为线索，大致勾画双方施于美英文论的主要影响，以及后者内部受本土因素制约而产生的相应变化。

首先是西马与美英左倾批评的历史渊源。关于此题，英国著名专家派瑞·安德森的宏观分析较有代表性。早在70年代中期，他即已指出左倾批评脱离实际、在同革命运动分离态势下的畸型繁荣与书斋化倾向。对此，他称作理论丰余、战略贫困的失调。及至讨论80年代的西马发展前景时，安德森着重点明作为左倾理论异化前锋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自1968年5月风暴后迅速崛起、并在一系列传统理论主题上发动解构改造的后果。这一“拉丁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性转移”引起欧美左倾思想界的普遍跟进，

理论上的主要特征为“语言增值，真理虚弱，历史随意化”。虽持批判态度，安德森不得不承认其挑战的重要，以及它在新形势下给西马提出的艰巨任务。在他看来，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派的重建努力尚难抵销前者影响，而美英左倾学者面临的困难不是缺少理论选择，却依然是战略贫困，即无力作政治行动^⑦。

安德森的仲裁从侧面表明，美英新左派自70年代西马理论热潮之后，再度遭受后结构思潮冲击所落入的微妙处境。他们一方面难免思想混乱而又不甘轻易附和解构与重建的任何一方。另外也确因欧陆理论交锋而享有机动或比较的优越位置。毕竟他们的国情与传统不同，历史上不乏成功嫁接先例。对此，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多曾撰文说明他们自谋出路的经过，文章非但不避讳矛盾和被动，反而欣然承认自己的拼合借用。

在《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一文中，凯瑟琳·伽勒尔从美国左派集体经验角度缕述了运动生成的多重意义。她称新历史主义为双向牵引下形成的裂变产物，既是“左倾理论的幻灭”，又从中“获得启示和延续动力”。从特定背景看，他们大致经过三段调整而达到目前立场。先是在新左派时期吸收卢卡契、布莱希特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增强分离意识与反叛性文化实践，构成鲜明的自身特征，诸如崇尚文艺自治，颂扬现代主义形式威力，以精神解放为依托向资本主义发动革命批判。这种乐观自傲情绪在70年遭受挫折。左倾理论阵营内部，由阿尔都塞发起的意识形态与文艺关系辩论席卷英美，拓宽并松动了有关整体论、主体及上层建筑的传统观念，引导左倾学者回顾本雅明、马歇雷、戈德曼等人论著，并日益关注文艺的社会性生产和消费方式。

及至80年代，美国左派受后结构主义挤压，进一步放弃阿多尔诺式的文艺自治主张，祛除表征神秘观念，努力反省批评自身局限，如伽勒尔所说，此时“我们许多人既无法恢复对（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信念，又不愿向解构批评皈依”。在双方都不足以解释现状的窘境中，他们决定“维持文本分析和历史研究间的创造性张力”，同时深入话语考察并扩展阐释视界。这样，新历史主义得以避免将文艺视为单一的“简化肯定或颠覆性否定”，转而“确立一项第三选择，即把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还原为一种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有关主体受制于权力与社会功能作用的解释模式”。^⑧

再看新历史主义与后结构思潮的纠葛。以大气候论，西方人文学过去10余年里经历了普遍解构，是谓“走出人的时期”。随同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人拆解否定工作的进展，人文学术因其传统宏伟叙事的“神话破灭”而步入新的批判反省境界。尤其是自启蒙以来一直由“人”据守的知识中心逐渐呈现空洞，其间主体融化，结构消解，意义浮动，历史断裂，理性与科学的合法性成为疑问。这种“入学沉睡”状态的结束，是喜是忧，总之迫使文学批评正视知识的多元与局限，并在它日益丧失中心原则及元话语支撑的形势下，化解为多学科叠合交错的文化批评，同时产生一种理论与实践相混淆的世俗实用特征。

新历史主义于此际萌发，自然附着上述后结构与后现代烙印。譬如它在思想结构上松散开放，缺乏坚固严密系统；在知识态度上强调非整体性的局部认知与自我批判，否认知识的超历史的普遍与完美的可能性；在政治立场上含混易变，难以传统标准区分定位，又抗拒简化整合。与早年左倾的社会历史学派不同，它所弘扬的“历史化”与意识形态研究并非基于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援引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话语分析技术。与西马重建派不同，它声称无意追求新式马克思主义元话语，仅热衷于多向批评实践与广泛的对话交流。与李生的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也不同，它身陷“叙事危机、表征危机”囹圄，却积极乐观、生机勃勃。

在《走向文化诗学》论文里，格林布莱特坦诚申明他的新历

史主义决非刻意锻造的理论教条，而是来自切身的教研实践。70年代他曾在柏克利校园主讲《马克思主义美学》，后遭学生批驳而改授《文化诗学》。此即到达同解构批评、文化符号学、西马文论交汇的十字路口。由于福柯来讲学，加之欧美文化人类学与巴赫金思想的催化，他和一批同事选择了新历史主义道路。当时围绕资本主义发展对于文艺的支配逻辑，杰姆逊和利奥塔各持一端：前者坚守西马整体论，视资本主义为压迫性异化分解力量，要求恢复物质基础上针对政治无意识的统一批判；后者则推进后结构的否定逻辑，强调知识差异与非同一性，藉以对抗资本主义的整合驯良趋势。到底信奉哪一端的决定论？格林布莱特采取并收修正策略，提出要结合分解和整合原则，注重精神与物质的往返转换，细致探讨社会话语和艺术话语在历史限定下的交相“力学振荡”关系^⑨。此举确系一种创造性联结，导致福柯与西马理论的美式变异。

说到新历史主义和福柯的亲近一面，就不能不涉及它同解构批评的特别关系。应当肯定，双方都与后结构思潮有染，同为“法国理论病”在美国的临床反应。但前后对比强烈，几成互斥态势。究其隐因，有如下几点须予考虑。

第一，如上述，新历史主义的后结构理论启示主要来自福柯，尤其获益于他晚年对启蒙话语形成及“主体化”过程的示范研究，而解构批评自60年代末即奉德里达为导师和盟友，侧重文学文本的细读、辨异与形式分析。对此，福柯曾于70年代初提出警告，批评德里达及其美国同盟的“非历史化游戏倾向”，并在《话语的秩序》中展示了自己更宽宏的研究设想。德里达未作公开反驳，但两位强人分歧犹存^⑩。

第二，从组合成份与背景看，解构批评起于东部的耶鲁，系德里达外来理论同美国学院派批评的高层杂交，具有增强形式

主义统治并将其推向极致的作用，这使它在动乱形势下几乎取代了新批评的历史地位。而新历史主义从西岸生成，用欧陆新理论聚拢本土的边缘学术势力，代表激进的反教规倾向。如蒙特鲁斯分析，其成员多为新左派运动后执教从业的年轻学者，他们的种族、性别及文化差异突出，迫切要求教研机制的民主化改革，学术上标榜政治和社会参与，有意以新历史主义为反动力，“纠正并补偿美国文学研究长期遗忘历史的偏向”。^⑪

最后，解构批评与新历史主义的先后崛起，从整体看也基本暗合后结构思潮发展逻辑，即由早期围绕逻各斯中心批判开始的语言、心理解构逐步扩展为对整个西方人文学的反省和再造。在美国这个思想大熔炉里，欧陆理论遇热增温，激荡变形，连它们内在的次要矛盾和变化也能在接受过程中得到强化凸现。在新历史主义身上，后结构主义的文化批评及“非神秘化”实用倾向较为明显，这难免引起米勒等解构批评家关于“反理论”危险的抱怨；甚至因其对历史社会的重视而认为它是红祸。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础观念

以上粗略展开了命题的讨论框架。再进一步，即须简要圈点其中一些基本要点，并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即新历史主义到底“新”在何处？与其它受到西马或后结构思潮影响的批评流派相比，它拥有哪些特殊理论观念及主张？

在《新历史主义》导言里，维萨概括纷纭争议，举出五项所谓“关键性共识”或要旨：“1. 所有表现行为均植根于物质实践的网络；2. 所有揭示、批判与反对行为都使用它们谴责的工具，并易犯它们揭露过的错误；3. 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以不可分割的方式进行循环运动；4. 没有任何话语，想象的或文献

的，能抵达不变真理或表现固定的人类本质；5.最后，如本书所示，那种足以描述资本主义文化的批评方法及语言，必须介入它所描述的经济范畴。”^②

维萨归并的上述五点，以简约方式向我们提示的新历史主义的基本观念。从字面看，它们依次涉及文艺的物质基础，知识态度与人文批判局限性，广义文本及社会交流，差异历史观与考古方法，以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和表征规律。细究起来，它们背后又藏有各自的理论谱系，较多牵联到近年来的新进学术观点。根据中国读者习惯，下面试予以重新编排说明，适当补入一些批评性背景介绍。

（1）历史主义：新与旧之别。

“历史主义”一词来自德文Historismus。英译写作Historism与Historicism。前者未得流行。后者却因含有“历史化”（Historicize）的动态转意而为美英左倾知识界接受。其中有冤枉过正的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引入美英后，染有较重的机械的唯物论与经济决定论色彩。左翼运动失败后，这些附加弊端一度加剧了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片面怀疑和抵触。另外，基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理性史观，面临西方现代社会的急骤异变，自二次大战以来遭受广泛抨击责难，形成学术界所谓的“空前严重的历史主义危机”。^③上述两方面原因合力推进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针对历史主义（以及人文主体性、意义和思辨哲学等相关范畴）的持续攻击与论战。其主要线索由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起，经列维-斯特劳斯《原始思维》（向萨特唯物史观挑战）和德里达《论文字学》（粉碎逻各斯中心论），直至美国解构批评家德·曼等人深入考辨历史叙事法则——这一“反历史化”思潮愈演愈烈，结果导致自身裂解为两个支系：语言中心论者（德里达为首）和文化批评派（福柯为代表）。

结构、后结构思想有关历史主义的批判一度富有变革启发性。它们原本的设想是二元论，即一面肯定历史乃真实事件与客观规律的库藏，可供发掘意义、参鉴现状与未来；另一面尖锐指出其含混和人为，是文献、杜撰、修辞构成的共时体系，受形而上传统整合支配，因而应予分解澄明。但作为对“历史化了的世界”的幻灭反应，上述批判日益偏激，失去建设与平衡能力：历史被视为人的主观外部投射，人文主体变成了应予消解的虚幻神话——它们既缺少本体论上的真实，又无法归约或再现散乱世界的意义。随着语言和心理解构的深入，自启蒙以来形成的历史主义思想基石，如目的论、因果律、阶段说、主体观与理性进步概念等，无一不遭谴责质疑。在解构批评那里，批判“并不止于对线状发展与目的演进的摒弃，它攻击整个历史主义方法”，因为后者依赖着“本身并不具备使意义合法化权威的历史叙事”。^⑩至此，语言中心论者的思辨批判已步入困境。它否定历史叙事却又利用它为己服务，同时又囿于文本分析和符号游戏，引起普遍不满和抵制。如英国左倾学者默克瓦所示，德里达的名言“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实则象征着文学批评界的重大“思想退却”，即放弃文学作为西方文化阐释核心的功能，取消批评家介入政治社会生活的历史责任，进而导致人文学术各科的“思想文学化”偏向。^⑪

新历史主义由此获得反攻机遇，重提“历史化”要求以制衡“文学化”偏向。然而，它既非传统历史主义的原样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单纯的复兴。其理论胚胎孕育于结构、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改造思想之中。准确地说，此乃“解构了的世界中的历史主义”。它的新颖之处，若以符号变异来显示，就是从大写的单数历史主义（Historicism，暗指其传统元话语和整体观），变成了小写的复数历史主义（historicisms，喻其多元混合与差异方法论）。其中主要的理论成份，应举出福柯的知识考古和话

语理论。

（2）知识考古学与话语理论。

如前述，后结构思潮裂解为语言中心论与文化批评两支，而新历史主义追随后者，即福柯引导的“政治化后结构主义”及其泛文化阐释战略。这便同德里达以文本为疆域的“科学符号学”在气质与方向上形成了敌对。自然，双方均效法尼采的“创造性破坏”精神，都接受海德格尔有关“人的思想受语言制约”这一著名“知识局限”定理。不过德里达专攻逻辑思辨含义上的文本性与符号差异，而福柯将差异原则应用于历史改造，突出了文化变迁层次上的语言批判。结果是他参照结构、解构学者沿神话、心理、叙事、修辞等各路挺进的经验，较早设想出一种有关西方文明反省的“大文化研究范式”，并为后人提供了包容“当代科学、社会和文学思想”的成套实用工具。^⑥

福柯备受推崇的知识考古学与尼采的《道德谱系学》相仿，都贬抑传统史学的目的论与整体模式，都以差异观念和断裂方法为破坏手段，力图打乱历史演进规律，颠覆由大事与伟人拼合的宏伟叙事体系，消除人们对事物起源与知识合法性的迷信。目的则是重现历史被人为掩盖的复杂原貌：“为发掘西方文化的深层构造，我将使我们平静而显然不变的地表上现出裂豁、动荡和缺陷”，“那种创立历史整体观并将过去追述为平缓持续发展过程的传统方法须予以系统的拆解。”^⑦

知识考古学新颖之处在其话语分析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档案、知识场、权力-知识复合机制等概念。略解说如下。

所谓话语 (discours)，系指人类语言思维活动中具有潜在束缚力或评判权威的程序规定。它作为知识载体与思想传导，决定人以何种方式说话思考才算是有意义或为真理。因为是流变时态下“实践的语言”，它突破了索绪尔共时封闭的语言体系，拥有

非常规语法、语用、修辞规则所能取代的自身调控原则。通过它独特的社会性排斥系统（言论禁忌、歧视非理性与真理意志），话语保障了知识合法性并构成文化的“无意识基础”。^⑧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它能针对各知识领域“话语形成”过程，深入揭示人类社会组织从观念向制度化衍变的内在规律。如福柯对医院、监狱、学校及古代性道德规范的个案研究所示，话语实践不但涉及社会制约主题，而且因其残酷争夺、压制和合法化努力更具有“可怕的物质性”。

档案（archives）指某一时代由文字符号组成的文化文本总成。它介于当时的语法逻辑与人们实际谈吐之间，因此是把握历史的唯一库藏。但它不直接保留纯粹话语形式，而是高度杂异状态下话语自相冲突和筛选的结果。通过对档案的差异辨析，即能再现文化历史的“另一性”隐密。对其所含“社会文本”实行综合考察，亦使新历史主义学者发现大范围话语活动规律，从而获得文化批评视野。

档案的时空界线与知识场（*épistémé*）概念有关。这里福柯受爱因斯坦“场论”启示，假设西方文明自中世纪后历经启蒙、古典、现代三次知识型态断裂，产生彼此孤立无涉的四个知识场（含后现代）。它们各有不同的词与物表征模式及相应的认知规范。以此取代传统分期，福柯企图避开因果目的论，突出知识更迭的“临界突变”性与不规则偶因，深入探索自然、社会与文化复合结构中未知力量的运动与空间格局。因而有人谓其历史为开放的未完成结构，欲于“无序中证明有序”。显然新历史主义者也为他的“多元决定论”所支配。^⑨

福柯晚年将考古学改称谱系学，意在完成其具有破坏性批判力量的“权力-知识微观物理学”。此说承接尼采的权力意志观，将知识（*savoir*）与权力（*pouvoir*）并联，视其共有的欲